

平等政治权益: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族的追求

杨仁飞

摘 要:本文主要从法律、政治等层面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来西亚(1963 年前为马来亚)华人社会地位取得及演变过程,分析马来民族主义和英国殖民政府政策对华人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争取整个族群的政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奋斗,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依法享受了一部分公民权益,但是在马来人为主人,马来人地位优越至上的宪法原则下,马来西亚华族在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没有获得与马来民族同等的政治权利。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争取整个族群的社会地位,体现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特点,非常注重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保护和发展,并努力维护已取得的政治权利。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K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3)02-0078-09

二战以来,随着马来西亚(1963 年前为马来亚)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变和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演变,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地位发生重大变迁,华人取得了一些政治和经济权利,但是从华族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华族及华人在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没有获得与马来民族同等的社会地位。本文主要从战后马来西亚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变、华人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与限制、影响华人社会地位的诸因素进行分析,从中把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地位演变的脉络。

一、马来亚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变

马来西亚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最早可溯及二战之前。

在英国统治下,英国殖民政府给予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均十分有限,但“分而治之”是维护英国殖民利益的既定政策。著名学者埃默生认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起,英国政府已经确立了“马来人保护政策”,不许让华人享有与马来人相同政治权利的原则。

作者简介:杨仁飞,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曾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厦门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时在马来亚出生的海峡华人大多以马来亚为家乡,政治上认同英国,同是英国臣民,但他们却不能与马来人一样参与当地政治。巴素(布赛尔)曾指出,“法律对于马来亚各邦出生的中国人地位,规定得很不好。在实际上,他们取得受英国保护者的护照,但法律上他们是否拥有这种地位,那是值得可疑的。”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海峡华人的力量的壮大,尤其是一些海峡华人开始进入英国海峡殖民地议会之后,他们开始为自身的政治权益而呐喊,认识到争取与马来民族同等政治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海峡华人领袖之一,后来成为马华公会领导人的陈祯禄于 1932 年 12 月向英国驻马来亚的总督递呈了长篇政治宣言,要求赋予海峡华人政治权利,广泛参与行政会议与立法议会的权利,允许华人进入马来文官组(即殖民政府行政管理层)。

然而,英国殖民政府出于统治马来亚的战略考虑,未打算也没有考虑要赋予华人在当地的参政权和管理权,因此华人在马来亚实际上处于政治无权的地位。

二战以后,马来亚的华人为争取平等社会地位作了积极的努力。第二次大战结束时,英国重返马来亚,英国开始对马来亚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1946 年初抛出马来亚联邦计划《白皮书》,这一白皮书虽对各族人民的公民权利规定较为平等,但是马来苏丹却认为马来亚联邦政制安排将剥夺了他们的既有特权,马来民族主义者对此建议也十分不满,为此动员马来人进行抗争。英国殖民政府与马来族群进行了妥协,于 1948 年公布了对日后马来亚政制有重大影响的联合邦宪制,即《蓝皮书》,确立马来人优先的总原则。从马来亚联邦到马来亚联合邦,宪制基础完全改变。而联合邦宪制使马来亚华人对自身在马来亚的政治、经济前途产生切肤之痛,认识到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占马来亚 1/3 以上人口的华族争取应有的平等政治权利,从而争取达到与马来人一同成为马来亚主人的政治意愿。为此马来亚华人展开了争取公民权和平等政治权利的斗争。这种努力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争取整个族群的政治利益而努力。无论是马华公会还是马来亚共产党,无论是海峡华人公会,还是中华总商会,尽管政见不一,这些华人社团不仅关心每一个华人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而且更关心作为一个族群的利益与平等政治权利。这种族群观念和政治追求,基于近代以来华人社会整合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华人民族主义精神及族群凝聚力,同时受到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整体性的族群意识的凝成对战后马来亚华人社会地位的确立有着一定的影响。

二是争取华族与其他族群平等政治权利始终贯穿整个历史过程。尽管华人最重要的政党——马华公会曾在历史上与马来人政党采取妥协的立场,以尊重马来人的优越地位来换取华人的政治身份——即解决华人在马来亚的公民权,曾希望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逐步实现各族的政治平等。但他们确实为马来亚华人的平等社会地位进行了自己的努力。1948 年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所发起的抗争运动是马来亚华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首次、规模较大的族群总动员,是华人作为一个族群来关心当地政治的具体表现。

三是争取公民权成为争取华人政治权利的首要任务。1957 年前,200 多万华侨是否能获得马来亚的公民权直接关系到华人对马来亚的政治认同和在马来亚的社会地位。公民权的解决,使得马来亚华侨得以“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变为马来亚的华人。为此华社积极争取以出生地为原则的公民权,要求放宽归化公民的居留期及语言限制。经过不懈的努力,华侨的公民权问题在独立前后逐步得到解决,使得大多数华侨从此成为马来亚的合法公民,成为马来亚的华人,依法享受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

四是争取华文作为马来亚的官方语文和华文教育的生存发展。一个族群本身的语文能否成为官方语文不仅直接体现该族群的政治权利,而且对族群文化的保护和各种优秀传统世代传承起着直接的作用。马来亚华人充分认识到语文官方地位与华文教育对华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为此进行了积极的争取。然而在当时马来人将争取华文官方语文地位视为华人沙文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华文难以成为马来亚的官方语文。不过在华人的积极争取与努力下,华文教育在变幻的政局中得以保存与发展。

对华人来说,二战以来马来亚的独立运动既是华族对新兴马来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大考验,又是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重要驿站。通过参与马来亚的建国,华人与马来人一道成为新兴国家的公民,华人通过对马来亚的国家认同,使自己的政治命运与马来亚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为了维护独立后取得的政治权利与其他权利,为了最终达到各族政治上平等的理想,华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的争取。

一是推动公民权和选民登记,为华人参政奠定群众基础。独立前已成为马来亚公民的华人有 110 多万,1958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华人公民数已达到近 200 万人,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华人公民权问题。在推动公民权同时,华社也积极推动选民登记。经过发动选民登记后,华人选民数不断增加,到 1959 年已达到华人合格选民总数的 33%,1964 年增加到 38%。在都市地区,由于华人居住集中,华社的组织能力与影响力较强,在 60 年代,有四成的国会选区华人选民占了多数,有两成的国会选区华社至少拥有 30% 已登记的选民。K. J. Ratnam 在他的专著中指出:“与 1955 年相比,1959 年选民群最显著的特征是非马来人选民的比例大幅增加。1955 年马来人的优势还是压倒性的,然而如今选民的族群分布已越来越与人口的一般分布相吻合。”

二是通过政党方式参与政治。独立前,马华公会是华人参与政治的唯一政党;独立后,马来亚的政党政治有了一定的发展,华人政党也有较大发展,分化与组合一直在进行。到 60、70 年代,除马华公会外,华人政党还有陈期岳的马来亚党、林苍佑的民主联合党及民政党、劳工党、人联党等。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在 1969 年立法会大选中,创造了华人参政史上最好的成绩。民主行动党派出 23 人参加国会大选,48 名参加州一级议会选举,结果有 13 人当选为国会议员,31 人当选为州议员;民政党有 8 人当选为国会议员,24 人当选为州议员,而且还成为槟州议会的多数党。然而这一年华人政党的突出表现,却给马来人的政治优势和“马来西亚为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敲响了警钟,成为族群冲突的导火索。从 1969 年华人在议会选举中的进取并不是朝有利华族的社会地位方向发展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尽管 1957 年独立的马来亚和 1963 年成立的马来西亚建立族群多元化的社会,但两族围绕着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议题争论不休,族群矛盾难以化解。通过这一事件还反映出华人要在当地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是件不易为之事。

三是继续争取华文的官方地位和华文教育的生存发展。1957 年马来亚独立后,华人继续未竟之事业,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发展华文教育,保持华族文化传统。作为马来亚公民或马来西亚的国民,华人认为自己既是建国的一分子,在独立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将自己的文化纳入国家文化总体系统中言之有理,语文和教育成为华人仍努力争取的目标之一。

四是争取政府实行公平合理的经济政策。大多数华人认为,政府扶持马来人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实行不公平的经济政策,希望政府矫正施行新经济政策的一切偏差,包括过分强调土著利益至上,以消除民族两极化不良现象,实现一个繁荣和团结的国家理想。

二战以来,华人在争取各种政治权利的同时,完成了整个族群对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国家认

同,从而也基本实现侨民社会向移民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与积极争取,从而改写了华人毫无政治权利的历史。然而马来西亚历史与政治现实决定华人难以取得与马来民族同等的社会地位。巴素(又译布赛尔)曾指出:“南洋的中国人从没有政权,因此他们从未也不负任何政治上的责任。法律都是别人制定的,他们仅仅是履行了政府允许他们履行的职责”。

二、二战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权利

一个国家中公民或族群的政治权利是由宪法所规定,并通过政府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来实施的。宪法是全体社会成员实行社会自治的总契约,也是规定人民权利的契约,它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又根据一定程序对基本权利的主体活动进行限制。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宪制、1957年马来亚独立宪法及以后修订的马来西亚宪法对公民的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也对各族的政治权利作了明确的规范,可以说是决定二战以来,特别在独立后华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文件。在宪制性文件下,我们还须考察各种政策实施过程中,即实践层面的各项重大政策对华人的政治权利构成实质影响。

从马来亚(马来西亚)宪制来看,法律既有赋予华人一定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权利,也有严格限制与约束的一方面。

1948年联合邦宪制的重要原则,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确保经济发展和建立有效的行政系统;继续维持各邦及各殖民地的特殊性;向所有将马来亚认作家乡以及以马来亚为效忠对象的人们提供公民权,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必须加以保护。联合邦宪制提到了英派驻马来亚的钦差大臣负责保护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保障其他族群的合法权益。在这一原则下,华族及其他族群作为一个群体利益得到一定的重视。联合邦宪制规定,联合邦行政会议的正式语文为英文,但在一定的场合允许使用马来语。由此可以看到英文和马来语文地位在联合邦协定中已得到规范,而华文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这基本上奠定了今后马来亚国家语文政策之方向。

当然,在联合邦之下,华人的政治权益得到一定的重视。懂英文的华人在立法会的代表名额比战前有一定增加。公民权也开始向一部分华人开放。但由于公民权条件较为苛刻,致使绝大部分华侨及子女不符合这一公民权之规定,不能申请成为公民,或难以申请成为公民。1950年,只有35万的华人英籍民和15万归化公民,这一数目约占当时230万华侨华人总数的19.56%,可见4/5的华侨被拒成为马来亚的公民。

虽然联合邦宪制比战前的殖民政制有了一定的进步,扩大了一部分代议权,以宪法的方法提到了保护其他族群的合法权益。但是正如当时代人及后人评述的那样,英国殖民政府采行马来人为主人,视其他族群为外来移民的原则。^①这就产生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权利有高低之分,有主人与客人之分,这一精神有悖于近代以来民主平等之理念。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宪法及各种政策对华人政治权利作出更加明确的规范,从而也产生较大的影响。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以来,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总的立宪精神基本没有变化。本文将从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和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来分析华人拥有的政治权利。

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对于华人基本政治权利的规范表现为概括性的表述,有关公民政治权利及华人类群的合法权益几个方面比较笼统。^②如宪法第八条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享受法律之同等保护。^③这是包括每一个马来人在内的所有马来西亚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华人所独

享。由于平等权的规定建立在马来人有永久特权的基础上,华人享有的平等权因而变得十分狭窄。宪法同样也赋予了全体公民言论、结社、信仰等方面的部分自由权。^⑭如宪法第三款确立回教为国教之外,允许其他宗教信仰存在。规定“人人皆有信奉任何宗教之权利,除第四款之规定者外,并得传布其宗教”。^⑮不过回教作为国教的优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宗教是不能随意向回教徒间宣传其教义或教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民虽享受宗教自由,但各种宗教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公民的平等与自由权利是相对有限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如议会有很大的裁量权,公民和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因政府的政治动机和考虑而受到不同层次的制约。如1964年的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国家可以用法律限制公民的结社、言论等方面的自由,甚至出现只要被指控“在言行上不效忠马来西亚联邦”,这个公民就可以不必加以详细的说明,一经定罪即可剥夺此人的公民权。^⑯另外马来亚独立前后实行了长达十二年的紧急状态,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巴素在评论邓普勒(TEMPLE)将军实施的紧急状态措施时指出,马来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没有人能够替自己做主,马来亚发展的时钟似乎在紧急状态下停顿了。^⑰马来亚独立后任首相东姑拉曼也承认,紧急状态对人们的自由及生活所施的限制,几乎成为所有马来亚人生活的一部分,紧急状态消耗了马来亚的精神与物质资源。^⑱因此无论是在正常的环境下或是在紧急状态下,公民所享受的自由是有相当大的约束。紧急状态结束后,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又称“内安法令”,政府可以不经审讯就可以逮捕或拘留政府认为违反此法的政治犯。这个法令给了政府广泛的权力去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各类政治反对派。^⑲1972年后马来西亚国会制定了宪法修正案,规定禁止在公共场合讨论一些敏感的问题,任何涉及马来西亚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马来族的特权、公民权、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以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等问题的公开讨论,即便是作为国会议员,也被认为是煽动性和危害治安的。^⑳

从有关华人经济权益保护的宪法条文来看,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及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均将保护华人合法权益内容写入其中,这对华人社会来说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联合邦宪法第一五三条规定,最高元首应依本规定保护马来人之特别地位及其他种族之合法权益。^㉑这一规定约束性不强,但象征意义重大,从而从法律层面确认了整体华人族群的经济利益,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现实经济地位。该条第七、八、九款还对有关经济权益作了较详细的规定,特别是第九款规定了不授权国会单独为马来人保留权之起见,实行限制商业或职业。这与当时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普遍采取歧视与限制华人经济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差别。

客观上来说,马来西亚华人比起印尼、菲律宾的华人来说,马来亚联合邦及马来西亚宪法还是较好保护他们经济利益,也赋予了华人一定的政治平等与自由权。但这些权利与保障不能与马来人相提并论,宪法对马来人有特别的规定。

从宪法条文分析,宪法赋予马来人的优越政治权利更加明确,处处体现出建立马来人为主的马来亚或马来西亚的强烈政治和族群意图。首先宪法确保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马来人手中;为了确保非马来人不能利用普选制度和国会威胁马来人的政治权利,从法律角度对选举制度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了各种特殊的安排。^㉒1969年“5·13”族群冲突发生以后,马来西亚议会修改宪法,禁止质询马来语的官方语文地位、马来人的特殊地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以及公民权等规定,取消议员在国会中的言论不受司法约束之豁免权,从而更加明确马来人特殊地位之不可挑战。

与华人政治权利规定不同,宪法均突出、强调马来人特殊政治权利。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第一五三条是有关马来人特殊地位的重要宪法条款。因此从宪法的角度来看,马来人与华人的政治权利

确实不同。

从实际政策层面来看,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均对华人政治、经济权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看,马来亚政府从独立开始就鼓励马来商业资本的发展和马来资本家的培养。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国家经济马来亚化的过程,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扶持马来人企业。^③事实上这些扶持政策与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④

70 年代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可谓是一场由马来官僚精英集团掌控国家机关,并以国家机关的力量作为主导,以马来民族为中心,夹杂政经资源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提高马来民族的社会地位及文化自信心的重大改革运动。尽管新经济政策从马来社会的角度来看,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这种以国家干预的方式来协助马来人的办法,即“拐杖政策”,长期来看,对其他族群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

教育文化政策方面对马来西亚华社影响最大。独立后政府加快了整个国家系统的马来化,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和武器,教育政策也适应这种决策的转化。马来西亚政府努力推行国民教育(单一语文教育)体制,使非马来语学校基本上实行马来语教育。之后政府相继出台不同的教育报告书及教育法令,这些教育政策、措施被华社认为是对华人文化与教育的吞噬。^⑤华文教育在艰难的挣扎与争取中求生存、求发展。

在国家文化政策方面,政府亦极力推动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价值体系。1971 年 8 月 16 日至 20 日国家文化大会提出了三项国家文化概念,1976 年成为国家文化的三大原则,即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的原住民文化为核心;其他适合及恰当的文化原素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原素,但必须符合第一及第三的原则才会被考虑;回教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原素。^⑥虽然其他文化没有完全被排斥,但在这样的文化政策之下,华族等其他族群的文化只能靠自身努力才能维持生存下去,求得发展的空间比较小。

马来西亚政府独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渐进统一的马来亚教育与文化政策,旨在建立以马来人为主、马来文化为主体的国家认同,但是由于在宪法层面及政策措施方面,政府对不同的族群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立场,这使得其他族群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压力反而促使马来西亚华社倾全力保全华族的文化特色和促进华文教育延续性,围绕着国家认同问题,教育、文化政策长期以来是马来西亚重要的政治问题。

三、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地位的因素分析

1957 年马来亚独立前后,华人大部分获得公民权,从而改写了整个华族的国家认同。而正是这种国家认同的转变,使得马来亚(马来西亚)政府、议会通过法律的途径赋予华人公民在国家中的宪法地位,依法保护华人的经济活动和权益,由此华人获得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如有信仰、宗教自由,华人文化习俗可以保留和传承。这些基本权利的取得,关键在于华族的社群优势和经济优势。但是二战以来华人始终未能争取到与马来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有以下一些方面的原因:

一是英国殖民政府和马来统治者和政党精心设计的产物

在政治学上,政治权力要实现的目标主要是利益,既有物质上的利益,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利益。这种利益刺激权力主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战后马来亚的权力安排反映了这种利益的分配与安排,充分照顾英国殖民政府和马来统治者的利益。马来亚对英国来说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经

济利益,这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及政府希望马来亚的政权和平转移到可以信赖的马来人手中,而不是由华人掌管。^{②7}1956年由英国政府指派的宪制调查团为马来亚草拟宪法,李特宪制调查团的工作纲领乃是要体现英国在马来亚的利益之延续和保护马来人的权益。^{②8}巴素指出,马来亚的宪法、法律都不是华人制定的,而且宪制制定者还对华人带有极大的偏见,这不利于华人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

二是马来民族主义对马来亚新国家的影响

20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内涵,即坚持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原则,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②9}

民族主义要解决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马来人在争取自身的权力同时凝聚了力量,通过反对联邦计划而解决了马来亚各邦之间的认同问题。而非马来人对马来亚的认同问题,一方面通过独立前政党联盟通过协商与各自让步的方式基本上解决了政治层面的认同问题,以对马来亚的忠诚向非马来人开放公民权,使大部分居住在马来亚的侨民都能成为马来亚新国家的公民,从而解决了对新兴马来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但是文化认同之路漫长而遥远。

建立民族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分配性问题,马来民族主义要求经济上的平等。马来人认为他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低下是不公平的,要求按自己的喜好来改变国家收入分配。^{③0}“马来人必须比现在取得更多的国家财富,但只有这些计划作为国家经济规划的一部分时,方能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③1}

在建立马来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被利用并且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不要别人统治”和“当家作主”的思想占据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整个头脑,而马来民族主义及政党通过建立马来亚基本上为马来人之马来亚国家的方法来解决建立新兴民族国家存在的问题。这种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在具体立法及政策制定中的影响,确实对二战后华人社会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是族群、政党协商机制对华人政治权利的影响

在现代马来西亚政制发展史上,1949年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各族代表之间的协商与妥协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所确定原则乃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的基础之一,决定了今日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基调,对华人政治权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48年年底到1950年,马来亚各族群联络委员会讨论马来亚自治与建国中的重大问题,如国家认同、族群关系等当时十分敏感的问题,如各族的最后目标是否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马来亚国家?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内涵是什么?是否所有联合邦公民不论种族均有平等之地位、机会和利益?马来亚国民最后的资格是什么?^{③2}巫统与马华公会的各族代表们最后同意马来亚为马来人家园的基本原则,马来人在联合邦内“有特殊地位”,确保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假以时日也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当然在承认马来人特殊地位的大原则下,委员会(主要是巫统)也基本同意,所有联合邦的公民(通过适当的途径)应不分种族在联合邦内享有平等地位、各种利益和机会,同意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对马来亚忠诚,视马来亚为永久的家园;难以分离的忠诚应作为考虑接纳这个人为公民的适当指引。另外还讨论了今后马来亚的语文问题、国教、教育政策等诸多问题。^{③3}

从以后马来亚(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脉络来看,1948年—1950年各族协商之成果及以后联盟内部的政治协商,确实对马来亚之后独立及宪法之制定有承上启下的作用。^{③4}马来亚宪法与马来西亚宪法体现这种协商的精神。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由马华公会与巫统达成的政治协商(政治交易),

但是本人认为这种协商以及妥协其实是两个族群政治与经济力量之间的较量。我们从当时谈判、协商中的难度来看,马华公会领导人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在当时的环境下,靠马华公会乃至整个华社的力量都是无法改变建立马来人马来亚国家的大方向。华人政党与华社积极争取政治权利的努力与抗争使得巫统的立场退了一步。因此过分指责马华公会为此牺牲华社利益是不适当的。为了马来亚华人取得政治权利,是宁可玉碎要与马来人争到底,还是在现实面前妥协与让步,这一问题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当然,影响当时华人政治权利的影响很多,其中也有华人内部的因素。如华人对马来亚的认同刚刚开始,对居留地的政治冷淡,多不闻不问;华社内部对争取华人政治权利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甚至内部矛盾不断,特别是未能就争取平等政治权利这一重大问题采取一致和持续的行动(马华公会与中华总商会等在华文教育等方面立场不一致),致华社无法凝聚一股足以强大的力量及统一的步伐去争取更好的政治权利。

从外部环境来看,战后冷战大国际环境对华人在当地国的社会地位带来极大的伤害。冷战格局与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纠缠在一起,使华族政治权利问题被扭曲为一个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及种族主义的问题。^⑤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东南亚华族在当地深受怀疑,其他东南亚国家还出现了严重的排华浪潮,华族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即使像人数众多、经济力量也不弱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也无法取得与当地主体民族一样的政治权利。不能不说,战后华人社会地位的确立,不仅是一个如何争取的过程,还涉及到许多原因。

综上所述,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宪制安排下,在马来民族主义的推动下,确立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基本上为马来人的国家原则。1957年独立后及1969年“5·13事件”后,为实践马来亚(马来西亚)为马来人国家的原则,政府采取了稳步、渐进同化的政策。政治上,马来人牢牢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文官队伍中,政府实施配额制,使得绝大部分的公务员由马来人担任,官僚机构马来化,将非马来人排挤出政府的决策及各部门;在经济上,通过国家干预和直接援手的方式,自上而下为马来人积累资本,扶持马来人经济的壮大。在文化领域,通过单一语文政策,推动以马来语为核心的马来文化价值认同政策;在教育领域,鼓励培养马来子弟,通过实施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以马来语为主的教育制度。而马来西亚华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侨民社会蜕变为公民社会,在新的国家中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平心而论,马来亚和日后马来西亚政府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渐进式的同化政策,没有比东南亚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强制同化措施来得突然和猛烈,这使得马来西亚华族虽感到有被同化的压力,虽对没有取得平等的政治待遇有不满,但没有灭顶之灾的感觉。为了争取整个族群的政治权利,体现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特点,马来西亚华人非常注重华族文化、价值体系保护和发展,在不断壮大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保护现有的政治权益不受破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马来西亚华人始终没有忘记华族的最终目标,即平等政治权利。

注释:

Emerson, R. Rupert, A Study in Direct and Indirect Rul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 Press, 1964, pp174-175.

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合订本,第79页。

陈祯禄:《呈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之备忘录》,载1932年12月23日《海峡时报》,转引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出版,附录。

朱自存:《独立前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林水樟等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 年出版,第 53 页。

1957 年 10 月 21 日《南洋商报》。

K. J. Ratnam, Communalism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 Press, 1967, p200.

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 年第 2—3 期合刊本,第 207 页。

华侨问题研究会编:《马来亚华侨问题资料》,联合书店出版,第 44—51 页。

华侨问题研究会编:《马来亚华侨问题资料》,第 44—53 页,及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人建国》之附录《运筹委员会之宪法草案》,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委员会 1972 年版,第 187—189 页。

崔贵强:《新马华人认同的转变》,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9 页。

⑪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第 57 页。

⑫⑬《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载《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1959 年出版,第 197—301、197、199 页。

⑭⑮《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载《星马通鉴》,第 198 页。

⑯《马来西亚联合邦宪法》,收于国民大会宪政研究会:《世界各国宪法汇编》第一辑,台北:1965 年出版,第 829—976 页。

⑰Purcell, Vitor, Malaya: Communist or Fre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5—6.

⑱1960 年 4 月 20 日《星洲日报》。

⑲Harold Crou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Malay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3.

⑳Barbara Watson Andays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MACMILLIAN Education, first published, 1999, P291.

㉑《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载《星马通鉴》,第 227 页。

㉒古鸿廷、张晓威:《马来西亚首相制度之研究》,萧新煌主编:《东南亚变貌》,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 2000 年 12 月出版,第 507—521 页。

㉓Government of Malay, First Five Year Plan, 1956 - 1960 and Second Five Year Plan, 1961 - 1965,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6 and 1961; Rudner, Nationalism Planning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Politics of Beginning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5, P5.

㉔何启良:《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林水榛等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第 70 页。

㉕郑良树:《独立后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 257 页。

㉖Kua Kia Soong, ed., Nation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Kuala Lumpur, Kersani Penerbit, 1985, PP2—3.

㉗㉘杨建成:《华人与马来亚之建国》,第 113、160—163 页。

㉙Ernest Gellner, State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

㉚迈克尔·罗斯金和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第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第 35—37 页。

㉛“Change our attitude”, In 1953 - 2 - 25 “Utusan Melayu”.

㉜CO. 717/ 183, 1949 年 4 月 22 日, Notes of Discussions of the Communities Liaison Committee held at Kuala Lumpur, 1949, in TCL/ 23/ 2, ISEAS.

㉝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 1949 年 8 月 19 日致殖民地部大臣之函件, in Clive J. Christie, Southeast As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Tanris Readers Published, 1998, pp193—195.

㉞1949 年 1 月 11 日, 8 月 10 日, 9 月 18 日, 1950 年 4 月 19 日《海峡时报》, 1952 年 12 月 4 日《马来亚邮报》。

㉟黄朝翰:《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9 月出版,第 2 页。